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朱熹与栗谷哲学 比较研究

洪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

洪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洪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ISBN 7 - 5004 - 3832 - X

I . 朱… II . 洪… III . 比较哲学 - 朱熹 - 1130 ~ 1200、李珥 - 1536 ~ 1584 IV . ①B244.7 ②B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9109 号

责任编辑 郭媛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谭国民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 - 84029453 传真 010 - 64030272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韩国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石源华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少普	石源华	朴昌根	任 晓
庄锡昌	沈丁立	吴心伯	金光耀
金应忠	金重远	胡礼忠	俞新天

本辑执行主编：石源华 洪军

总序

大约在一百年以前，韩国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隐士之国”，该国的情况还鲜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西方人士知之甚少。当时，欧美人士只知道这是一个远在地球东端边远地区无比寒冷的国家，那儿居住着一批信仰奇怪宗教的神秘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风风雨雨，剧烈变迁，如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

回顾韩国人民经历的最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 50 年是争取国家独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民族的奴役，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过程；后 50 年是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力争使国家与民族踏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过程。

韩国人民用他们的英勇奋斗与艰苦劳动为本民族争得了独立和富强，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扬。

韩国与中国是邻邦，又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按理说，中国人民对这么一位邻居应该知之甚多，知之甚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一度被割断了数十年。中韩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最简的限度之内。因此，原本不应该

如西方人那样把韩国视为遥远的“隐士之国”的中国人也把韩国视为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尤其是今日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其了解甚少。

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双方为对方打开门户以后，中国的“韩国学”、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立即兴起，并且蓬勃发展。这表明两国人民是多么渴望真切地了解对方。正如久违数十年的两位故旧好友，突然道途重逢。此时他们是惊和喜，询问是否别来无恙；然后则是急切地探悉彼此别后的遭遇与目前的境况。初始的激动心情平静以后还会探讨一下彼此之间是否有可能给予对方什么支持和帮助。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当然不会像朋友之间私交那么简单与朴实，肯定要复杂得多。但是，有一点还是十分相似的，即彼此会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对方的真情实况。1992年10月，即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两个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了。在这以后复旦大学校内的许多朋友，还有一些校外的朋友，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此以后短短的几年内，围绕韩国问题或与韩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会……还有一批年轻朋友来复旦大学做博士生、硕士生，专心研究韩国问题。这一情况出乎我们原先的预料。

再环顾一下周围，可以发现在这短短一段时期国内陆陆续续建立了多处韩国问题研究中心，“韩国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成长。这正好说明今日中国境内的环境与气氛适合“韩国学”研究的发展。

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韩国学”给予那么多的关注，是有许多理由的，我认为至少有那么几条理由，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韩国学”研究：

其一，韩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生活内容的国家，这是世界上众多文化智慧宝库中的一座，而且有她自己独到

之处，人们从这儿可以学习到许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人类的智慧。

其二，中韩两个民族是相处数千年的近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交往，从而也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如何科学地、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巩固与发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颇为重要。

其三，在近代，中韩两个民族还具有一段极其相同的历史遭遇，因而结下了互助互援、共同抗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血肉之情。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值得发掘与交流。这是我们两个民族共同的珍贵历史遗产。

其四，中韩两国过去几千年间社会形态、历史演变途径及近代的历史命运较为类同，然而在最近三十多年里，韩国率先跨出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走得又相当成功。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今日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作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借鉴。

其五，为了在两个民族之间建立牢固的友谊，必须彼此充分地理解，而彼此深刻理解的基础就是彼此全面的了解。要了解就必须展开研究。彼此应该深入地研究对方，以求深刻地、全面地了解对方。一言以蔽之，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我们也必须开展韩国学的研究。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

正是从这种种理由出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团结了一批朋友，从历史现状的诸多方面展开韩国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丛书的内容涉及韩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以及中韩关系等等方面。现已出版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丛书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怀，也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与好评，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计划一如既往，继续编纂这

套丛书。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庄锡昌

1997年10月14日

SUMMARY

The Comparison of Zhu Xi and Li Ligu'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s a New –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16th century Korea, Li Ligu (李栗谷), together with Li Tuixi (李退溪), were exalted as “the two masters of Zhu Xi’s learning” . The former initiated the Ji hu school (幾湖学派) and the latter initiated the Lin nan school (岭南学派) . Both of them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 Confucianism.

Entering Korea since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Korean dynasty, Zhu Xi’s learning ha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its dissemination with the emergence of such localized academic schools as Ji hu and Lin nan. Korean New – confucians were eager to grasp the spirit of Zhu Xi’s theoretical system. However, ow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his learning, Ji hu school and Lin nan school had given ou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It were some basic points like “the four beginnings and the seven emotions” (四端七情) that triggered fervent arguments among them, which finally set the Korean New – confucianism on the path of the abstract mental philosophy. Li Ligu and Li Tuixi both inherited Zhu Xi’s 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former’s grasp, in my opinion, might be somewhat better than the latter’s . As the sponsor of Ji hu School, Li Ligu on the one hand absorbed Zhu Xi’s thought and on the other hand

created his own learning with its unique traits. Li Ligu ful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Zhu Xi's Neo - Confucianism in Li (principle) and Qi (material) Theory, Xin (mind - and - heart) and Xing (human nature) Theory, Ge wu (gaining knowledge by the study of things and nature) Theory, Cultivation Theory. His Originality is reflected in "the abstruse beauty of Principle and Material", "Principle riding moving Material through Four Beginnings and Seven emotions", "Separate Descrip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ultivating Mentality through Experiencing the Original Mind" and so on.

Beginni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Zhu Xi and Li Ligu's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their social thought,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amine the constitution of Neo-Confucianism. Besides, a whole and systematic study will be made on the comparison of Zhu Xi and Li Ligu's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detail.

序一

李栗谷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巨匠，与李退溪并称为朝鲜朝朱子学的双璧。但是，从我们国内学术界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一般偏重“退溪学”的研究，而对“栗谷学”的研究相对较弱。洪军的博士论文——《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在中外有关中朝“朱子学”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比较了朱熹哲学与栗谷哲学，进行了深层的探讨，颇多创见。它是一项具有开创性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从朱熹与李栗谷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平事迹入手，考察了理学的产生以及朱子学的形成过程。论著还着重于朱熹、李栗谷社会思想之比较，分别其为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比较，论析清晰。在哲学思想上更为全面而又深入地比较了朱子学与栗谷学以及退溪学之间的异同，凸显出朱子学与栗谷学、退溪学各具的特色，说明栗谷在对朱子学的价值取向上又与退溪有所不同，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派。论著中指出：栗谷哲学在理气观上贯通“理气之妙”思想，在心性论上表现为“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以及“心性情意一路而各有境界”，在格物论上重视明道体认，在修养论上主张存诚养心等等。论著对栗谷的哲学思想是如何承继和发展朱子学，以及它的新的特色和贡献诸方面条分缕析，很有说服力。

通观全书，内容充实，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文字平实流

畅。洪军博士在攻博和博士后期间对李栗谷进行了精深的研究，曾将论文中的部分章节在国内有关权威刊物上发表，受到好评。他精通韩、日语，在资料的阅读和搜集上，有独特的优势。该论著是一部具开拓性意义且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然而，也还有不少地方有待继续研究。高兴地看到洪军博士论文出版，乐为之序。

潘富恩

于复旦大学

2002年10月

序二

古人云：“人一日无米则饥，一日无字则瞽”，诚如是也。洪军博士从学以来，孜孜以求，知广识富，学勤理明，可谓与“饥、瞽”无缘。

洪军博士师从德艺双馨的潘富恩教授，攻读博士，完成博士论文《朱熹与李珥哲学比较研究》，继又攻读博士后，研究韩国性理学史上的李退溪与奇高峰、李栗谷与成牛溪关于四端七情问题的论辩。对韩国哲学、思想做如此仔细、深入的比较研究，目前在大陆学界仍属起步之中，洪军是书也属凤毛麟角。

朱熹是中国古代继先秦孔子之后，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之所以影响久远，不仅成为元、明、清统治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的核心，而且在与所传播国本土文化的和合中，焕发了新的生命智慧，成为所传播国——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一定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影响其所在国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民俗习惯等。这是因为朱熹哲学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脉搏，时代的精神。它回应了佛教与儒教的冲突，以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开启了儒学的复兴，化解了儒衰佛盛的局势，并在和合儒、释、道三教文化中，开出了新的理学儒学的理论思维形态，而具有生生

不息的生命力；同时，它在化解农业社会君主专制制度下种种错综复杂的冲突，协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常关系中，凸显了其无限的魅力，而为东亚国家所认同和接受，使朱子学成为其统治意识形态；再者，东亚各国与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在这种交往关系中既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又不断消化，不断创新，使朱子学在适应东亚各国社会需要中新陈代谢，焕发了青春；第四，东亚各国、特别是朝鲜朝在朱子学指导下，获得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思想开放，学术繁荣，教育兴盛，礼乐文明。这是朱子学之所以获得东亚各国君臣和士子青睐的原因之一。

朱子学在其成为东亚各国统治意识形态过程中，东亚各国儒者知识分子（包括僧侣知识分子——日本）的传播、吸收、弘扬具有极大的功绩，没有他们的艰苦努力，在古代信息工具非常落后的情境下，简直是不可能将一种学说传播到另一国家、地区的。就在一个国家之内，由于暂时的分裂，亦造成学术的断裂。譬如北宋亡后，理学在南方流传，北方就中断了，只有待到元朝统一南北后，理学才在北方得以传播。从高丽末至李朝，朱子学在与李朝本土文化结合中，凸显了其蓬勃生机。到了被誉为朱子学双璧的李退溪和李栗谷之时，朱子学在李朝获得极大的发展，而成为主导的思潮。李退溪被称为“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李栗谷则被誉为“百世之儒宗”^[1]。宋时烈赞曰：“然道之体用之全未尽显，理之精微之蕴未尽明，至我栗谷先生出，然后体用之全，精微之蕴，靡不躍如，而斯文在兹矣。”^[2]道之体用、理之精微，是由于栗谷得以显明。所以时人以栗谷洞见道体，高明透彻，动静表里，明白正大，而后归宗于朱子学。“基于义理，洞见大源。其功程次第，一本于濂洛宗派，而得之考亭者尤深，故其门路之正，虽质之前圣而无疑。至于《六经》之奥旨，百家

之异辞，无不研穷，各极其趣。其立言著说，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3]此评不惟不高，亦不惟不确。栗谷思想在李朝之价值和意义，可做如是观。

洪军博士论文，把中韩各自历史上的大思想家朱熹与李珥在政治、经济、教育思想加以全面系统比较，特别在哲学思想层面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修养论等方面进行深入仔细的比较分析，探赜索隐，论述精详。从比较中可以窥见：一种思想学说的能传与所传，都有其内因与外缘。“能传”是指一种思想学说具有传播的功能；“所传”是指具有传播功能的思想学说能动地施加作用于所传的对象国。栗谷在传播朱子学，既有“照着”朱子学元典文本讲，亦有“接着”朱子学文本讲。还有“六经注我”式的“自己讲”。不“照着讲”，便失去朱子学文本的依傍，在李朝就不可能得以传播，甚至被视为“异端”；不“接着讲”，毕竟朱子学是源于中国的南宋，其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与李朝有异，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搬，而需要加以改造，对有些问题话语、话题需要加以重新诠释，赋予新的符合李朝所需要的内涵；进而超越朱子学原文本，而自己诠释，创造新义，这便是“自己讲”，只有如此，朱子学才能在与李朝社会实际的结合中，与时偕行，生生不息，这便是“日新之谓盛德”。

就栗谷“接着”朱子学讲而言，洪军博士在该论文中从“理气之妙”说、“四端七情”说、“知行分言”说、“存诚养心”说四个方面诠释了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修养论。从中揭示出栗谷诠释的新内涵和新意义。这里也含有独具匠心式的“自己讲”。这就是说，具有创新性的“自己讲”，往往蕴涵在“接着讲”之中，有时两者往往相依不离。如果说中国宋明理学的“核心话题”是“理欲之辩”，人文语境是复兴“孔孟道统”，解释文本是《四书》，那么，李朝朱子学的“核心话题”是“性理之辩”，人文语境是高扬朱子学的“四端七情”。“话题”和

“语境”的转换，标志着中韩朱子学的差分和在所传国的发展，以及朱子学的再创造。

从诠释学的视域来看，朱子学的再创造是诠释学的应有之义，而不是对于朱子学的背离。从朱子与栗谷哲学思想的比较中可以体悟出，当一种理论学说被传播时，可以从多视角来关照：从朱子学本身来看，在向高丽末传播时，朱子已故世，其文本已定型，虽其后学在继续诠释发扬，但朱子文本已不可变；从传播朱子学者而言，如何抉择符合于本国实际需要的加以发扬；如何发现其不适合处加以改造，而不全盘照搬；如何发掘文本中的核心精神和生命智慧，而加以再创造；如何使不可变文本而“与时偕行”，使之不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成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的文本等等。这些都是文化比较研究中所应关注和着力的，否则文化比较研究便成为学究式游戏。洪军的博士论文可以给予我们这些方面的启迪，是难能可贵的。

洪军博士在攻读博士后期间，我有幸作为他的指导教师。今博士论文付梓，我祝其成。同时，我也期望其博士后论文，精益求精，早日出版，以使李朝的“四端七情”之辩为中国学界所了解，为文化交流，学术对话，做出有益的贡献。

是为序。

张立文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2003年3月15日

注释

- [1] 《仁祖实录》卷十一，仁祖十三年五月庚申条。
- [2] 宋时烈：《紫云书院庙庭碑》，《栗谷全书》（二）卷三十七，成

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 1986 年版，第 399 页。

[3] 金集：《墓志铭》，《栗谷全书》（二）卷三十六，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 1986 年版，第 395 页。